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气象

杜学文

近年来,中国文学显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借鉴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转化外来创作手法,表现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与精神情感。这一点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新中国文学的重要一翼。它不仅为我们形象地勾勒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画卷,亦形成了相应的审美范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一般而言,它们比较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洋溢着蓬勃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注重描写人物性格,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不仅回溯了革命历史,亦在这种回溯中弘扬了民族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创作手法的日渐多样、创作理念的日渐丰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尝试、探索,使中国小说显现出新的面貌。

以近年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为例,它们在艺术表现层面的探索取得了亮丽的成就,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该作以抗战时期青年学生汪可逾奔赴延安途中滞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至挺进大别山期间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情节,充满诗意地描写了她的命运际遇,表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天命必然、革命战争的诗性品格,以及人之个体不染尘俗的生命之美。其中汪可逾的宋代古琴如同传统戏曲中的主题道具一般贯穿整部作品,具有极为明显的隐喻意义。小说基本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但时时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这种虚与实的统一又恰似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于无中写有,在有中见无。《牵风记》是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部极具审美个性、历史意识的高峰之作。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亦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极具现实意义的优秀之作。被视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在这部小说中强化了“叙事”的复杂性、神秘性,设计了一个在“未知”中求“有知”的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在那些可能被历史遮蔽的隐蔽战线的英雄身上闪现出的坚韧、执拗、奉献与智慧的品格,洋溢着沉入人之内心深处的理想情怀与奋斗精神。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思想、审美、创造诸多方面的巨大潜力与可能性。

作为中国文学重镇的山西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表现出新的气象。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特别出版“山西革命历史题材专辑”,收入了张卫平的《红色银行》、郭天印的《铁血围城》与蒋殊的《红星杨》三部长篇小说。

多年来,张卫平深入太行山、吕梁山,采访当事人、知情者,实地考察抗战时期红色银行的创办地、战斗历程,查阅相关资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红色银行》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吕梁山区兴县创办西北农民银行的革命历史。尽管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很多,但表现战争期间党领导的金融工作的作品却甚少。之后,张卫平又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英雄年代》。这部小说表现了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冀南银行创建、战斗、发展的历史。作者的描写对象更多地侧重于普通民众,力图揭示那个特殊年代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选择,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个人的成长与奉献。他们是历史洪流中的芸芸众生,更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时代英雄。

郭天印的长篇小说《铁血围城》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一带发生的著名的“沁源围困战”。郭天印长期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曾出版过长篇小说《太原保卫战》、长篇报告文学《长江支队》等。《铁血围城》的突出之处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小说的方式进行了重构,使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得到了很好的统一。这部小说特别强调了叙述的传奇色彩、人物的精神内涵。

蒋殊近年来创作了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如《重回1937》《再回1949》等。她的报告文学主要表现参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普通战士,表现他们平凡人生中的高贵品格,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参加革命对他们的人生的塑造与影响。而《红星杨》是蒋殊创作的儿童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灵感来自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王家岭亲手种植的杨树,树枝断面有红色五角星图案,人们认为这种树有神奇的含义。由此,她虚构了杨家将后人杨留贝等一群孩子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由懵懂无知到逐渐成长、成为革命战士的故事。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但蒋殊的特别之处在于以红星杨的意象展现出战争年代各式人物的精神世界。如杨留贝的爷爷、父亲,体现出中华精神传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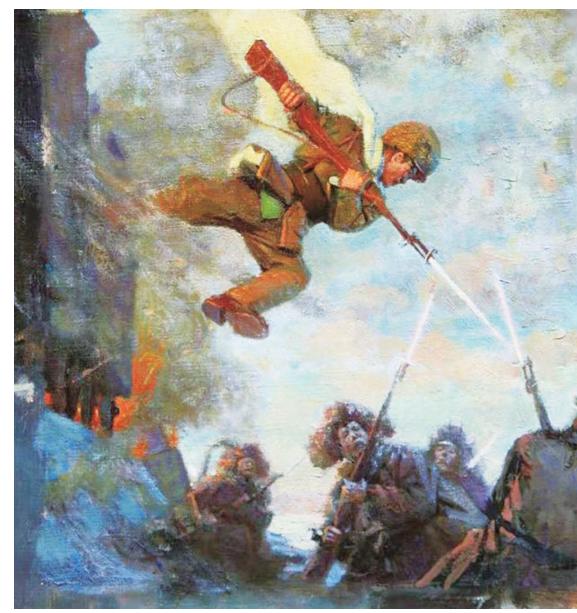
自;而日本侵略者则对“红星杨”这种自然现象十分惊恐,以为是抗日组织的一种标志;杨留贝等少年则由单纯地喜爱红星杨到逐渐形成了自己“红星杨”的革命信念,成为革命战士。同时,蒋殊还虚构了由“红星杨”喻示的不死精神,及由此表现的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生命之力,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一种诗化的意味。

就革命历史题材而言,山西作家的一大贡献就是有效地拓展了创作的题材领域。除红色金融题材外,铁路题材也得到了许多表现。林小静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火车”“铁路”进行。她的长篇小说《寻找消失的英雄》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太原铁路的地下党为解放太原作出的贡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内蒙古地区建设铁路线的动人故事。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流沙》以抗美援朝为背景,记录了当年山西铁路工人积极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修建与维护铁路运输线的英勇事迹。这些作品为我们打开了历史中鲜为人知的页面,进入了一个同样热血沸腾、令人振奋的时代。林小静的描写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色彩,她的文字激活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崇高之感,读之潸然泪下。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儿童文学作品多了起来。很多本来专注于创作成人文学作品的作家也开始涉猎这一题材。如徐贵祥以《历史的天空》等小说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他新近出版的《琴声飞过旷野》则是一部大别山区喜爱古琴的少年在战火中成长的信念之作。就山西作家而言,为孩子们写作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葛水平的长篇儿童题材小说《黄铜小号》以在黄崖洞战役中牺牲的少年英雄崔振芳为原型,加以作家的艺术虚构,表现了一位少年在战争中的成长与牺牲。小说没有简单地展示崔振芳作为战士的斗争事迹,而是从13岁的少年看世界的人生成长写起,详细地描绘他心灵深处的蜕变升华,以及面对民族危亡时的人生选择。郭万新的作品多以中国农村的变革为主题,近年来也涉足儿童文学创作。他的《双春年》是一部表现抗日战争期间儿童生活的作品,少年成长自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但郭万新的特点在于以少年的眼光回望历史,并赋予作品以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作品呈现出另一种情调。

双塔

文化



《林海雪原》插图 孙滋溪 绘

雪原上的红色传奇

左 领

《林海雪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传奇性革命历史小说的典范,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重要代表。作品以东北民主联军小分队剿匪斗争为主线,巧妙融入了作者曲折的亲身战斗经历。它凭借独特的叙事策略与精妙的文学表达,呈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革命历史的进程,生动展现出革命文学激昂的气质与理想的光辉,谱写了一曲热血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赞歌,彰显了人民的伟大力量。

作为一部洋溢着民间传奇色彩的小说,《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是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理念——以小家之殇激发守护大家的决心,用集体胜利成就个体价值,使得革命胜利承载着实现个体价值与告慰亲人的双重思想内涵。

小说开篇以少剑波作为叙事核心人物,通过其惊闻姐姐鞠县长噩耗的情节,瞬间将个人刻骨铭心的家仇与宏大的革命使命紧密交织。当土匪令人发指的暴行在文本中展露,群众“咬着牙,直瞪着眼,吐射着无穷的烈火”的集体反应,有力强化了剿匪斗争的正义性与紧迫性。由此出发,文本中的“血债”概念,早已超越少剑波的个体仇恨、杨子荣对恶霸杨大头的憎恶,升华为全体民众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仇恨与抗争,成为激发全民反抗的精神火种。这种叙事策略巧妙地将革命使命与传统的民间正义观相融合,为小分队的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奠定了坚实的情感与道德根基。同时,作者还通过通俗质朴的语言和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将“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大战四方台”四场剿匪战斗生动呈现,实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动态平衡。

与之相契,富有象征意味的白描手法,也成功构建起了鲜明且极具辨识度的人物谱系,以服务于革命叙事的主题。少剑波的精悍俏爽、健美俊俏,暗合其果敢睿智、指挥若定的内在气质,同时也符合革命英雄的飒爽英姿,使其成为正义与力量的象征;白茹的精巧玲珑,细腻地映射出其作为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所特有的聪慧、善良、坚韧与勇敢的内在品格,通过这一鲜活的个体,展现出革命集体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力量与贡献。而座山雕的光秃脑袋、阴鹫鼻子等形象特征,则隐喻出其扭曲的内心世界,将反派人物的丑恶内心直观呈现出来,由此成功构建起了鲜明且极具辨识度的人物形象。这种鲜明的美丑对立与夸张浪漫的艺术塑造,不仅符合革命叙事的民间转化需求,更使得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达到了迅速区分善恶、明确革命斗争对象的作用,增强了作品的传奇性和感染力。

同时令人称赞的是,作品大量借鉴了中国传统古典小说如“三国”“水浒”“说岳”等民间话语的构筑,使其在艺术方法上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大量富有生命力的俗语、俚语与民谣,给小说文本注入了生活气息、实现了生动立体的表达。例如,传统民谣“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传递出火车象征的希望与富足,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基于现实被剥削情境发生的“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则勾勒出特殊时期土匪掠夺的灾难信号。两组民谣相互映衬,既生动展现了人民在匪患中艰难生存仍心怀不灭的希冀与渴望,又深刻揭露了反动力对人民幸福生活的严重阻碍。这种叙事手法使革命叙事跳出空洞说教,扎根于人民真实的生活境遇与情感诉求,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林海雪原》是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之作,传奇性与思想性兼具,在当下和平年代重读这部经典,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呈现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更在于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对当代人的思想指引。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些在烽火中淬炼出的坚定信仰、无畏勇气和集体主义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生动诠释洪流中的坚韧灵魂

——《英雄年代》的群像塑造

董晓可



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以此为聚焦曾诞生诸多重要文学作品。对此,张卫平的长篇小说《英雄年代》(作家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独树一帜,作品没有单纯着眼于前线的浴血奋战,而是选取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作为写作题材。小说着重刻画了一群满怀希望与勇气的人物群像,他们在混乱与困境中勇敢站出来,凭借智慧与坚韧,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这些性格鲜明的角色,作品以另一种视角展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生动诠释了岁月洪流中的英雄灵魂。

恢弘时代背景下人物群像的展示,是《英雄年代》的一大特色。在作品中,战争前沿的根据地,遭受日军残酷侵略与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百姓生活困苦,经济建设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这一特殊环境下,为了建设冀南银行,无论是像高捷成这样有金融实践经验的专业精英,还是像吴子谦这样有特殊经历的技术人才,抑或是石老爹这样负责后勤保障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小说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各类人物齐心协力、英勇奋斗的艰辛故事,来呈现那段不平凡岁月中一个个平凡却伟大的英雄个体。

在作品中,作家还通过多声部的人物对话与矛盾,彰

显了人物灵魂的深度与丰富性。无论是各色人等构成的银行工作人员,还是鱼龙混杂的普通百姓,均以鲜活的生动形象展现了革命事业主题下的多元价值立场与情感诉求。正是基于此,作品中的矛盾冲突才更具文本张力。人民内部因经济资源分配产生的分歧,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工作与整体利益的权衡;外部与日伪经济斗争中的惊险较量,让人物在困境中不断成长。以印钞厂为例,吴子谦因连若烟失误大发雷霆,与肖必利激烈争执,后三人相互理解、共同成长,性格得以完善,关系也更紧密。在石老爹家庭内部,石俊娥反抗包办婚姻,石保明怨恨父亲,可经历波折后,一家人相互理解、关系升华。这些矛盾冲突,促使人物灵魂在困境中得到锤炼,变得更加坚韧、丰满,深刻地展现出人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复杂变化。正是这些多声部的人物对话与矛盾,让《英雄年代》中的人物形象饱满立体,灵魂的丰富与深刻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在这种恢弘主题与多声部构筑基础上,《英雄年代》真切地书写了英雄灵魂的精神内涵。这,既表现为战争残酷性对于人性的考验与家国情怀下的英雄主义,还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俗感情。从前者来看,作品中,战争残酷对人性的考验犹如一把烈火,淬炼出人性中最纯

粹的部分。那些无名的小战士,在缺衣少食、武器简陋的困境下,依然毫不退缩地坚守阵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着敌人的进攻。家国情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从地方乡绅捐出全部家产支持抗战,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唤醒民众,再到普通工匠日夜赶制军需物资,他们虽身处不同阶层,从事不同职业,但都怀着对祖国深沉的热爱,支撑着整个民族在危亡之际屹立不倒。而在后者中,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感中的英雄精神,恰似涓涓细流暖人心扉。邻里间为保护抗日志士的孩子而冒险隐瞒,夫妻间在分离时互相激励坚守信念,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些均打破了英雄与凡人之间的壁垒,也让我们明白英雄精神源自生活中的点滴善意与坚守。

《英雄年代》通过这些丰富的故事,以及不同层面英雄精神的相互交织,不仅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还真象化地告诉我们,英雄并非遥不可及的超凡存在,而是在时代洪流中,每一名坚守正义、勇敢担当、心怀大爱的普通人。这些英雄共同铸就了那个充满苦难却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英雄年代,其精神内涵也将穿越时空,持续激励着后世之人坚守正义、勇敢前行。

文之为德也大

——管窥历史地理学三大家的文风

韩晨光

写云梦泽,在考证其方位的七百多个字里,引用了《水经注》《尚书疏》《尚书集传》《子虚赋》《读史方舆纪要》《汉书·地理志》《禹贡锥指》《周礼正义》《春秋大事表》《水道提纲》《清一统志》等十一种著作,详者四,略者七,像是仙人王子乔带我飞在云端指点阡陌,畅快极了。

史念海先生则没有这么磅礴,他愿意平易地讲给别人听。写春秋时期的交通,他的角度是诸侯的会盟与征战。“晋国有事于中原各地,其出兵当是由它们的都城锋越太行山而至当时的南阳。这个南阳为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方,本为周人故土,周襄王时始以赐晋。在此以前,齐国的军队曾经越过太行山而西至于汾水流域。太行山绵亘广远,然齐桓公所越过的当在太行山的南端。现在地图上的析城、王屋之间,殆为齐师经行的地方。因为齐桓公不仅越太行山,而且还到过卑耳。卑耳山正在太行山西南黄河以北。这一条道路在以前大概不是经常通行的……”这段话全是陈述句,也没有点明文献,平实极了,但不好写。从绛到淄博,将近1500华里,几座大山,几座要塞,几千年的时光更迭,史先生破解历史的迷雾一一指给你看,他安排了晋和齐的部队在太行山会面,一场大战宛在眼前。

观点见性情

学术论文就像洋葱一样,带情绪的东西要剥开文字和观点才看得到。或者说,学者的观点本身就是他情感的表达。写什么、不写什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侯仁之先生谈及承德西沟新河的改造。清乾隆皇帝立碑,说这是为了使百姓免遭水患。但侯先生考据河道位

置和文献后,发现皇帝修新河,还是为了避免山洪冲垮御路。且乾隆“为了开凿新河,又拆毁南山下不少民居,迫使百姓迁移。虽说是‘计屋授之值’,也是徒有其名,纵使有一点迁移费,照例是要被官吏和工头‘中饱’的”。又查清光绪十四年(1888)惠迪吉门外龙王庙一通残碑,上书“同治末年、光绪九年、十一年,迭被水灾,地方不堪其苦,官民交困,几致不能存立”,足以说明这条新河没有起到防治水患的作用。

谭其骧尝作《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他说“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社会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渴,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必然关系”。这段话没用一个问号、感叹号,但谭先生对于儒学强烈鲜明的态度跃然纸上。

史念海先生的文章朴实,我基本看不到他对于历史和地理的个性化评论。我以为这样的学者,大巧若拙,直拳到肉,算是相宜的。直到我看《我国古今气候的同异》,他说:“以竹证温寒的变化终究勉强,不如征引《秦风·终南》一篇为合适。这篇诗说‘终南何有,有梅有条’。”之后,他旁征博引说明了用竹论气候变化的不妥,几千字读下来,《诗经》、汉赋信手拈来,丘处机的诗、袁小修的笔记,无不入文,平平淡淡就把用竹子考证我国气候变化的观点驳斥干净。这样的魄力和风雅,令人回味。史先生就像是隐居农圃的剑侠,随手折下一支竹条,指天画地,断古定今。临了,把竹条编进了扫帚里,低头打扫起一方稼轩。

会意融古今

学者写文章是为了表达观点。学术文章不是一般的抒情,观点要靠资料支撑。这几位老先生是把材料放进磨盘磨成了汁,喝到肚子里,融到血液中,滴在笔砚上写出来的。具体观点怎么体现,各有各的办法。我读谭其骧先生